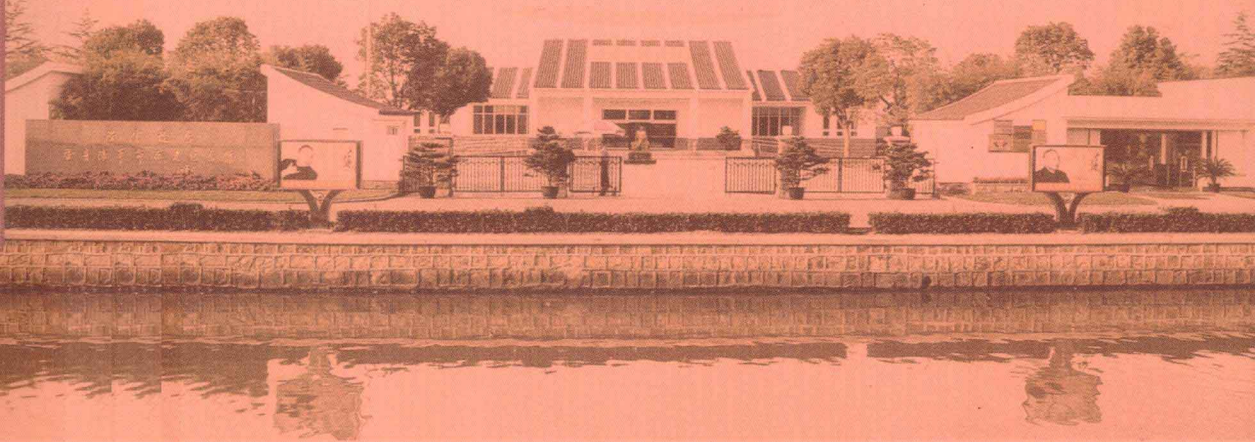


上海陈云研究

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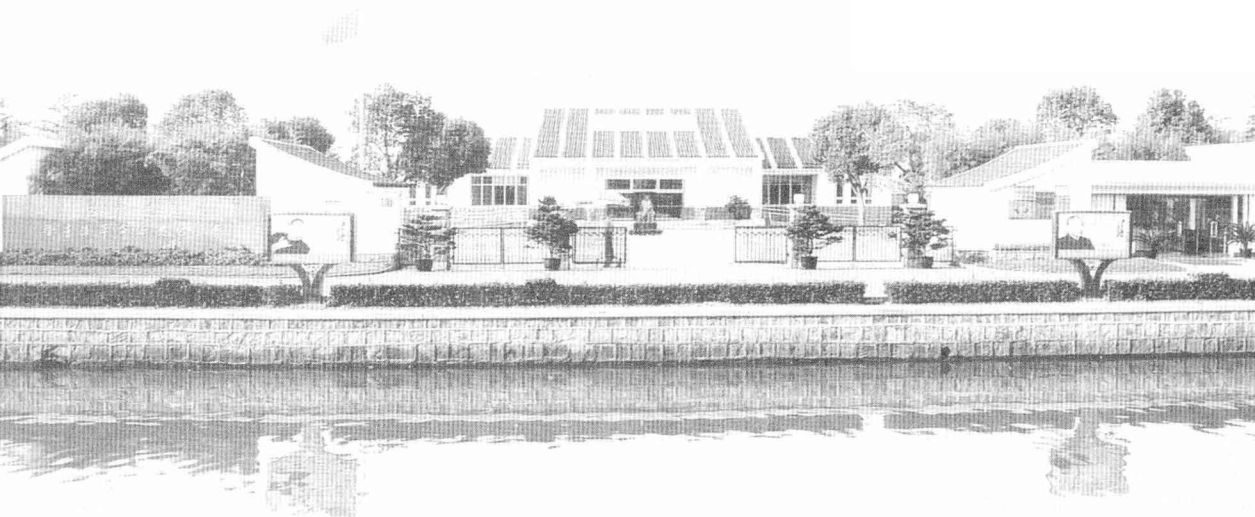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陈云研究

纪念陈云诞辰106周年

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陈云研究:纪念陈云诞辰 106 周年/陈云故居
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 2011

ISBN 978-7-80745-872-2

I. ①上… II. ①陈… III. ①陈云(1905~1995)-
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7309 号

上海陈云研究——纪念陈云诞辰 106 周年

编 者: 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

责任编辑: 言 孙

封面设计: 闵 敏、周伟峰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872-2/K · 138

定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委会

顾 问：马春雷

主 编：马 玉

副 主 编：马继奋

编 委：马 玉 马继奋 刘晓明 王震凤 曹自求

执行编辑：房 中 张伊丽

美术编辑：周伟峰

目 录

生平业绩篇

- 谈谈对陈云同志的学习思想和学习精神的体会 陈 元 / 3
- 改革开放初期的陈云与邓小平 朱佳木 / 6
- 陈云与陕甘宁边区经济危机的化解 王 杰 / 23
- 陈云在新疆开展党的统战工作的历史条件与思想基础 宋月红 / 39
- 陈云稳定物价的基本经验
- 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前后 张金才 / 51
- 陈云探索、决策新中国化肥工业论析 叶明勇 / 66
- 陈云与新中国的交通运输事业 李学如 / 73
- 试论陈云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历程和贡献 曹自求 / 82
- 陈云支持党报发展的历史考察 刘启芳 / 92
- 浅论陈云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方 芳 / 98

思想风范篇

- 陈云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展开 曹应旺 / 107
- 陈云与新中国经济论纲 迟爱萍 / 120
- 陈云对待资本与资本市场的思想实践探析 董志凯 / 152
- 陈云延安时期的经济思想及其意义 赵士刚 / 164
- 陈云对推进党建工程的奠基性贡献
- 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谈起 王家云 / 172
- 党的建设科学化视域下的陈云党建思想 丁俊萍 苏咏喜 / 182
- 陈云对经济管理的理论创新和政策贡献 冷兆松 / 189
- 陈云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张凤翱 / 195
- 抗日战争时期陈云指导青年工作的思想及实践 言 稀 / 202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钜制

——对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的解读 房 中 / 208

往事追忆篇

学习陈云同志的“十五字”方针 陈锦华 / 219

陈云同志建议追认翁泽生为革命烈士的经过 林 江 / 222

我参加了陈云组织召开的 1961 年小蒸农村调查座谈会 张惟惠 / 225

一次接见一片真情

——忆陈云 1955 年接见颜安中学师生的一段往事 金学廉 / 230

忆陈云同志视察小蒸中心小学 徐禄英 / 235

馆藏文物篇

陈云给胡启立的信

——关心评弹艺术的健康发展 严 玮 / 239

自卫还击战纪念杯 王 晋 / 241

生活必需品——铝制水壶 晓 妍 / 242

史海钩沉篇

陈云在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 余建亭 / 247

陈云与张元济的情缘 林坚强 / 251

陈云与西柏坡 王彦红 史进平 / 256

陈云与新场 青浦区史志办 / 261

研究综述篇

在第四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 张星星 / 267

近十年来陈云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述评 叶张瑜 / 273

2005 年以来陈云党建思想研究述评 李 冰 / 283

十年回眸篇

陈云中南海旧居文物“回家”记 马继奋 / 293

回眸纪念体系不断拓展的十年 青 史 / 300

文博论坛篇

中国纪念馆刍议 张秋兵 / 309

关于博物馆纪念馆情景再现的实践与思考

——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为例 杨荣彬 / 318

后记 / 323

第**1**篇

生平业绩篇

谈谈对陈云同志的学习思想和学习精神的体会

陈 元

我的父亲陈云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也是学习的一生。关于学习，他有一系列精辟深刻、生动务实的观点看法和经验总结。我愿意在此与大家共同研讨陈云同志关于学习的思想和学习的精神，为我们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提供一些启迪和借鉴。

一、贯彻和体现科学理论武装的要求，坚持科学理论对学习活动的指导作用。陈云同志一贯倡导广大党员和干部要重视学习，加强理论武装，认为学习是党的政治优势，是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早在1939年，他就在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文章提出：“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每个共产党员都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他还讲过：“对个人来说，要增加又要减少，增加就是要学习，减少就是要把‘包袱’放下，放下‘包袱’也是增加力量。这个力量的增加是不可估计的。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

陈云同志一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情有独钟，把“学好哲学，终身受用”作为学习的总则。他认为学哲学就是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在延安中央组织部时期，他认真研读了经典著作，对毛泽东哲学思想非常推崇，理解领会得很深刻。“文革”时他受冲击下放到江西蹲点的时候，别的都没带，只带了三箱书，把马恩列斯全集都带去了。他有一句口头禅，哲学学得不好，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懂得抓主要矛盾。“文革”中，他在给我妹妹陈伟华的信中，也谈到了学哲学的问题。他的这些观点，特别是要通过学习首先解决指导思想问题，要掌握马

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的观点，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对于我们党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是要我们着重学习和贯彻的。

二、要贯彻和体现具有世界眼光的要求，善于用国际视野和历史眼光，观察与把握时代发展要求。陈云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培养锻炼出了观察形势与问题的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眼光。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大舞台上，他极其关注国际形势和各国的政治形势变化，重视研究各国包括西方国家的经验。同时，他考虑政策、思考问题又始终注意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谋划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他经常分析全球经济情况，十分注意比较外国与中国的发展经验。他尤其关注苏联、美国等国家的情况，了解苏、美怎么做，做了些什么，哪些可以吸收和借鉴。比如，他从头到尾看了苏联农业部长考察美国后写的《美国农业考察报告》一书，把美国农业作为专门课题研究，认为有很多地方值得借鉴。在下放江西时期，当时正是美国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跟黄金脱钩的时候，他非常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自己亲自收集报纸上的文章进行研究。“文革”后期，他受周总理委托，主管对外贸易并承担研究国际经济形势的任务。他率先提出“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并亲自指导有关部门研究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国际金融和货币、世界市场价格等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当时说，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多相同相似之处，大家都在摸索当中前进。

三、贯彻和体现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在工作实践中检验学习成果。陈云同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15字名言，也深刻体现了这一思想。这15个字，他讲了一生，坚持了一生。他晚年与一些同志的交谈和给一些同志的题字中，谈得最多、写得最多的也是这15个字。他自己对这15个字作了诠释：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有些同志说，陈云同志的这15个字，是他对于自己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的高度而精辟的概括，代表了他的哲学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丰富和发展。他对我们讲过，“不唯上”并不是不听上级领导的话，“不唯书”也不是不读书报文件，重要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解决问题。他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这是

一项需要把握规律、不断创新的工作。他特别重视把学习与工作紧密结合,通过学习深化对规律的认识、创造性地提出开展工作的思路 and 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认为调查研究是探寻规律、实现创新的根本方法,并且认为调查研究方法要对头,一是“沉”下去,不要走马观花;二是调查研究要细致全面。他始终恪守“交换、比较、反复”。他经常说,集体讨论,找各种不同的人交换意见,是达到全面认识的重要方法。他不停地学习吸收外界的东西,不停地分析、判断和比较,思考并找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他进行一项工作,处理一件事情,就像画图画一样,不断加以补充修正,力求让画面越来越清晰、丰富、真实、完美。

陈云同志十分注重学习对具体工作的指导作用,强调“学以致用”。他说:“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在陕甘宁边区主持财经工作时,他就反对照抄照搬《资本论》和一般的经济学原理,主张从边区实际出发。他曾说过:“你卖盐就要研究卖盐的问题,卖布就要研究卖布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面对大规模工业建设和人口过快增长而农业增产较慢的问题,他花了很大精力去研究如何提高粮食产量。除了亲自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他还借阅了很多中外专家论述农业发展的著作,光是从中国农科院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借的书就有60本。他特别反对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认为这两种主义都把理论与实际、学习与工作割裂开来了,而二者是必须结合的。要从推动工作出发进行学习,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正确地指导实际工作。他的这种学习和研究问题的作风,同我们党倡导的学风是一脉相承的。在当前我们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实践中,也应继续坚持和发扬这种学习和研究问题的作风。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事业成功之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和认识党的建设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决策。陈云同志在学习方面树立的典范,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实践中,重温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学习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是很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的。

(作者单位:国家开发银行)

改革开放初期的陈云与邓小平

朱佳木

邓小平和陈云是新中国核心决策层中政治寿命最长的两个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政治舞台上起关键作用的两个人。因此,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关系很自然地成为那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互间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然而,学术界在研究那段历史时,对他们往往是分开论述的;即使放在一起比较,也大多局限于某一具体事情。中国大陆之外的学者虽然重视对他们的比较研究,却总是过分看重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有的甚至夸大他们的矛盾。上述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他们两人的关系,也不利于客观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为此,本文尝试从陈云的角度,谈谈对他和邓小平两人改革开放初期关系的认识。

关系之一:携手启动改革开放

任何一项政策的推行,必要前提是:第一,该项政策的倡导者要有相当的号召力;第二,要使该项政策的倡导者处于决策的位置。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政治舞台,能提出新政策而且能为大多数高级干部所认可的领导人,最具资格的首推邓小平,其次便是陈云。问题只在于如何使他们尽快回到决策的位置上。

陈云和邓小平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重要领导人,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分别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当林彪在1958年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补为党中央副主席后,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排名次序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陈云因主张“反冒进”在1956年受到严厉批评,又因主张“分田到户”,从1962年起受到政治冷遇,并在“文革”中被从中央政治局排除出去。邓小平则在“文革”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

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打倒；1972年虽重新起用，但1976年又因所谓“刮右倾翻案风”被再次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然而，当刘少奇受迫害致死，林彪因叛逃机毁人亡，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病逝后，“文革”前的七位中央常委仅剩他们两位健在。前者还保留着党中央委员的职务，后者也保留着党员的身份。因此，他们两人成为党内资格最老、最有威望、最有可能带领全党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决裂，并为中国开辟新道路的领导人。这是理所当然、毫不奇怪的。

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虽然停止了“文革”，并开始纠正某些“左”的做法，但总体上仍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的决策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阻挠、拖延邓小平职务的恢复。在这种情况下，陈云顶着政治压力，在1977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挺身而出，提交了要求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的书面发言，促使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正式表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1]这场政治较量的胜利，加快了邓小平复出的进度，为启动改革开放赢得了时间。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回到了决策岗位。随即，他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改革与开放、民主与法制的主张，推动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为1978年底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成功转移党的工作重点、最终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在1978年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率先提出应当尽快平反历史上的重大冤假错案，带动与会代表向“两个凡是”的方针发起了总攻，打乱了当时那位主要领导人的阵脚，改变了会议的原定议程，把会议开成了具有开启历史新时期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同样是在那次会上，由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竭力主张，以及与会代表的强烈要求，陈云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从而大大加强了中央决策层中改革开放的力量。由于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那时中央最高决策权实际已经转移到了邓小平手中。他后来谈到以他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时说：“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即叶剑英——笔者注）。 ”^[2]在这四人中，邓小平和陈云的排名分别在叶剑英和李先念之后，但由于他们的资历、能力与威望，自然成为决策层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所谓改革，在经济体制上，说到底还是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市场作

用；在政治体制上，说到底是处理好集中与民主的关系，扩大民主的范围。所谓开放，说到底是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文化的交往，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的管理方法，从经济上同国际市场接轨，加入全球化进程。在这些问题上，陈云与邓小平有着基本一致的主张。

对于扩大市场作用的问题，陈云 20 世纪 50 年代就很重视，并力图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加以实行。中共八大期间，他曾提出过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在生产方面，国家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构想虽然未能实现，但却在许多干部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 年 3 月，他在经过 20 多年的实践与思考之后，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思想，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要有市场调节这一条。”^[3]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部分，一为计划经济部分，二为市场调节部分；而且，在今后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部分的数额不是此长彼消的关系，而是“都相应地增加”。^[4]以后，他把自己的这一思想，概括为“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

那时，邓小平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观点与陈云是完全一致的。1979 年 11 月，他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5]1982 年 4 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全国一盘棋，主要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轨道。”^[6]正因为如此，“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被写进了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目标模式。江泽民总书记 1995 年在纪念陈云诞辰 90 周年大会上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率先批评过去计划工作中的弊端，“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7]他这段话指的正是这个意思。

在扩大民主方面，陈云的观点与邓小平也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两人都遭受过“左”倾错误的打击，对缺乏民主的弊端有着切肤之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对人说：“现在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开讨论。”^[8]在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把“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

条件”，作为自己闭幕会讲话第二部分的标题，并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9]1980年，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更加系统地分析了我国一度缺少民主的制度原因、历史原因和思想原因，指出这种现象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于集中、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有关，与旧中国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有关，与对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的误解和个人崇拜的风气有关；提出要从健全法制、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划分中央领导机构的任务和权限、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制度、实行党委决定重大问题一人一票的制度等多个方面，解决现行制度中的弊端。^[10]

对于党内民主的问题，陈云早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说过：“这几年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些人对是否能真正发扬民主表示怀疑，这是不奇怪的。”^[11]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后的即席讲话中，他又指出：1957年，毛泽东曾提出要求全党达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由于种种干扰，很多年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有可能在全国实现。”^[12]中共十二大前，他审阅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稿，看到里面讲“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革”发生的重要原因。他指出这种说法不对，“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13]后来，他又多次提出，要允许大家提不同意见，“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14]他还在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民主制度化的问题，强调：党内“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15]正因为邓、陈两人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观点，那几年，我国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人民民主，都比改革开放前不知扩大了多少倍。现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在沿着他们当年指引的正确方向，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深化。可以说，我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享有这么多切实的民主权利。

在要不要对外开放的问题上，陈云与邓小平的观点也是相同的。“文革”后期，陈云一度部分恢复了工作，在国务院业务组（该组织是当时处理日常经济建设问题的最高领导机构——笔者注）中，协助周恩来负责对外贸易的政策，并积

极参与了从西方国家引进总额达 43 亿美元的机器设备和技术的工作。针对“四人帮”鼓吹的那套闭关锁国的极左理论,他提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16],进口大宗货物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17],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棉花、钢材等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18]。所有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对外开放的先声,与邓小平复出后提出的一系列对外开放的主张,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陈云与邓小平在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一致主张,是他们携手启动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

关系之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相互支持、配合和补充

政治领导人由于分管工作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有时也会在某些事情的关注重点和认识迟早、深浅上产生差别。因此,事业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政治领导人尤其是核心决策者之间能否汲取对方的长处,并给对方以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各项事业之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很大程度正是依赖邓小平与陈云之间这种相互支持、配合和补充。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国国民经济因“十年动乱”而显现比例严重失调的状态。然而,由于多年来注重基本建设投资而忽视消费的惯性作用,也由于受广大群众要求把“文革”耽误的时间尽快抢回来的急迫心情的影响,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仍然延续过去那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要求 1985 年粮食和钢的产量分别达到 8 000 万吨和 6 000 万吨,还要建十大钢铁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并把“跃进”的希望寄托在大量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上。对此,陈云在 1978 年夏天的国务院务虚会期间就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对李先念和谷牧等国务院领导人说:“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19]在 1978 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除了那篇要求在政治上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之外,还作了一篇主张经济建设上既要积极又要稳重的发言。针对提交会议讨论的 1979、1980 年经济计划草案,他提出要用外汇先进口粮食,说现在有中美联